

胡适经典论丛
Hushi Jingdian Luncong

胡适

论治学

陈平原 / 选编

Hushi Lun Zhixue



G795
1

Hu Shi / 胡适经典论丛
Jingdian Luncong

胡适

论治学

Hu Shi

Jun

Bi xue

陈平原 /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论治学 / 胡适著; 陈平原选编.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11

(胡适经典论丛)

ISBN 7-5336-4544-8

I. 胡... II. ①胡... ②陈... III. 胡适(1891~1962)—治学方法 IV. G7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4170 号

选题策划: 唐元明

责任编辑: 唐元明

装帧设计: 黄彦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50×960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60 000

版 次: 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4 000

定 价: 23.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2822632

邮 编: 230063

Hushi / 胡适经典论丛
Jingdian Luncong

- | | |
|-------|--------------|
| 胡适论文学 | 夏晓虹 / 选编 |
| 胡适论哲学 | 欧阳哲生 / 选编 |
| 胡适论历史 | 雷 颐 / 选编 |
| 胡适论社会 | 止 庵 / 选编 |
| 胡适论教育 | 季 蒙 谢 泳 / 选编 |
| 胡适论治学 | 陈平原 / 选编 |
| 胡适论人生 | 沈卫威 / 选编 |
| 胡适论宗教 | 王稼句 / 选编 |
| 胡适论红学 | 严云受 / 选编 |

选题策划 唐元明

责任编辑 唐元明

装帧设计 黄 彦

导 言

陈平原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没有人比胡适更喜欢“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了。少年得志,万众瞩目,再加上身处社会(知识)转型期,“先知先觉”的适之先生,于是再三强调“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这“科学方法”说来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或者可以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①。从一九一九年撰写《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到一九五二年在台湾大学作题为《治学方法》的连续演讲,胡适几十年金针度人,都是在“假设与求证”上做文章。“一以贯之”的好处是旗帜鲜明,以至今人一提到“科学方法”,似乎便带上胡记的痕迹;褒贬暂且不论,单是一般读书人的这一最初印象,便足证胡适的成功。当然,这种高度化简因而便于传播和接受的“科学方法”,从一开始提倡就受到不少专家的质疑。正因为如此,半个多世纪关于胡适学术功过的争论,往往围绕其“科学方法”展开。

胡适一生所写“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的文章,据说总数约在百

^①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新月》1卷9号,1928年11月。

万言以上。这种统计当然是依照胡氏本人再三表白的,将其“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做讲学问的方法的”小说考证包括在内^①。一九二一年《胡适文存》首版,胡氏首次强调其各式各样的讲学文章,都可做方法论文章读,因“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②。晚年回首平生,胡氏依然提醒读者注意其著书立说均围绕“方法”打转,故“‘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③。只是胡适在金针度人时,有时指的是思想原则,有时指的是治学方法,有时又力图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胡适自述思想,总是强调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前者的怀疑主义以及“拿证据来”口号,使其得以展开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全面批判;后者的思想五步法,使其提出名扬四海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可是,作为一种思想原则的“怀疑”与“评判”(相对于“迷信”与“盲从”),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立场,不一定跟赫胥黎挂得上钩。连胡适论述“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时”,引述的也是尼采的“从新估定一切价值”^④。所谓摆脱古今中外的偶像,防止被各式各样权威“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撇开具体语境及针对性,这只是新文化人普遍认可的怀疑精神;胡适的特出之处是把“做学问的方法”与“做人处事的态度”结合起来^⑤。“把态度和方法连在一起说”,强调“科学心态”(scientific attitude mind)和“思想习惯”(habit

① 胡适:《治学方法》,《胡适研究从录》28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② 《〈胡适文存〉序例》,《胡适文存》一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

③ 《胡适口述自传》105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

④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一集卷四163页、153页。

⑤ 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将“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的“科学态度”以及“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三者并存陈说,作为其“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的具体内涵。

of thought)的重要性,这点杜威、胡适师徒一脉相承^①。不过,胡适之所以在中国思想学术界独树一帜,主要还是归功于其将杜威“思维术”与清人考据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弄出一套对于中国社会简直是“对症下药”、因而极其容易推广运用的“科学方法”。专家们尽可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作为这一科学方法的通俗表述,仍然不胫而走,成为上世纪中国最响亮的学术口号。

讲了一辈子“科学方法”,可根基在一九一九年——那一年将作为胡适的“方法年”进入史册,此后的无数文章都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引申发挥。年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和年底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都涉及一点“科学方法”(比如“评判的态度”或“审定史料之法”);可正面展开论述的当推《实验主义》、《少年中国之精神》、《论国故学》和《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四文。正是在这四篇文章中,胡适将杜威的思维术和清代的考据学做了成功的“嫁接”,为日后大张旗鼓“整理国故”准备了有效的理论武器。

杜威论思想,分作五步说:疑难的境地;指出疑难所在;假设解决方法;决定何者有效;证明。这五步中,关键在第三步,故“杜威一系的哲学家论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设’”^②。随着胡适的兴奋点逐渐从介绍杜威思想转为提倡科学方法,“假设”与“求证”的位置发生微妙的变化。先是思想五步法被化简为重事实、重假设和重验证的科学方法三要旨,强调的是一切理想学说在未经验证之前,“都只是待证的假设”^③。这一程序的转换,跟其时注重怀疑、反判权威的“新思

① 参阅周策纵《胡适风格——特论态度与方法》(《传记文学》1987年3期)所录胡适答周氏问“态度”信,以及对杜威《怎样思想》(How We Think)1910年初版本和1933年修订本如何论述“态度的重要”的介绍。

② 殷海光:《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思想与方法》158—159页,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

③ 《少年中国之精神》,《少年中国》1卷1期,1919年7月。

潮”相吻合，且便于与胡适别有会心的考据学接榫。果然，在《论国故学》中，胡适表彰清儒的考据“暗合科学的方法”，今后的任务只是如何“把‘汉学家’所用的‘不自觉的’方法变为‘自觉的’”。清儒“有‘科学’的精神”，在胡适看来，此乃“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除了赞扬其实证精神外，胡适当然也不会忘了指出汉学家“很能用假设”。于是，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经过一番杜威思维术的洗礼，就成了如下两点：

(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①

从“最注意假设”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再到后来提出的不二法宝“拿证据来”^②，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理解与阐扬，越来越偏向于实证。

这种误读，与胡适本人的学术根基在文史考据大有关系。早在接受杜威思维术或赫胥黎的存疑主义之前，胡适就对清人的治学方法感兴趣。《藏晖室札记》中记载早年考据文章的试作以及中外考据学思路的比较，都明显体现乾嘉学术的影响。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使得胡适加深了对科学研究基本步骤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这让他悟出现代科学法则与古老中国的考证学在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一东西方治学方法原本一致地发现非同小可^③，它既使胡适终生服膺的“科学方法”得以广泛传播，也使杜威的思维术和赫胥黎的怀疑说进入中国时几乎毫无阻力。借助于清儒家法来引进杜威和赫胥黎，这种东西合璧的“科学方法”，自然只能以其最小公约数“实证”

①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一集卷二 216 页、220 页、242 页。

② 《存疑主义》，《努力》23 期，1922 年 10 月。

③ 参阅《胡适口述自传》107—108 页。

为根基。

世人总是假定留学生长于西学而短于中学，归国之初，胡适喜谈考据，或许不无策略的考虑。这无疑是一着高棋，没人因此怀疑胡适对西洋哲学是否真的精通，只顾赞赏其“能兼治‘汉学’”。蔡元培序《中国哲学史大纲》，首先指出的正是胡适的“稟有‘汉学’的遗传性”；而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更断言其“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①。前辈名流的褒扬，使得新秀胡适迅速在学界站稳脚跟，可无形中也为其塑造了新旧兼通、少年老成的形象。为了满足这种社会期待，暴得大名的胡适自觉地日渐“汉学化”。别人犯点常识性错误问题不大，他胡适必须字字言之有据，免得留下千古笑柄。成为学术明星后，胡适治学日趋严谨，不大敢像早年那样“乱发议论”。三十年代还有些“小胆的假设”（如关于《醒世姻缘传》作者的考辩等）^②，四十年代后则基本上只从事“小心的求证”。

自认有“历史考据癖”的胡适，愿意为庐山的一座塔费几千字的考据，或者为一部《水经注》的版权花二十年的功夫^③，既然是“玩”，全看个人兴致，旁人实在无权说三道四。只是由于胡适领袖群伦的特殊地位，连“玩考据”也得说成是学界的头等大事，这可就勉为其难了。晚年胡适花许多笔墨为自家研究《水经注》案辩解，可越说越不清楚。这也是名人的悲哀，公众的期待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学界领

① 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② 《治学方法》中称其“《红楼梦》自传说”是“小胆的假设”，而关于蒲松龄著《醒世姻缘传》的猜测才是“大胆的假设”（《胡适研究丛录》283页、287页）；在我看来，二者刚好相反。

③ 参阅胡适的《庐山游记》（《新月》1卷3号，1928年5月）和《〈水经注〉考》（《胡适研究丛录》）。胡适屡言“治《水经注》五年”，研究者则认定胡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学术兴趣，重点在考此《水经注》案。参见费海玘《胡适著作研究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

袖胡适既不敢“大胆假设”，又无权只是“小心求证”。

二十年代著《戴东原的哲学》，胡适明显重“通核”而轻“据守”。承认“清儒治学最重立言其据”乃是其“绝大贡献”，可不忘强调“心知其意，而一时寻不着证据”时，“不妨大胆提出假设，看他能不能解决困难，能不能贯串会通”^①。这种“通核之学”，必须有一点“高远的想象力”，非只“勤谨和缓”四字诀所能囊括^②。三十年代中期胡适曾批评罗尔纲《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一文“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因“我们做新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胡乱作概括论断当然不可取；可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只能回避文献考订之外的所有“假设”。六天后胡适再次去信，其中一句话或许有助于我们对其心境和思路的理解：

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③

这话太像陈寅恪此前几年对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评——“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④，以至于令人怀疑二者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即使这只是巧合，三十年代日渐专业化的学术界，对胡适“高远的想象力”造成的压抑，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学术研究进入常规建设阶段，不像“五四”时期到处是吓人的“大假设”和“大结论”；加上学界群雄并起，很难再允许谁独领风骚。胡适深知其中利害，治学时不免如履薄冰。

① 《戴东原的哲学》12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

② “想像力”见《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四字诀”参阅《论治学方法——给王重民的一封信》、《致陈之藩》和《〈水经注〉考》。

③ 参阅罗尔纲《师门辱教记》49—53页，桂林：建设书店，1944年。

④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余英时曾指出兼长考证与义理的戴震，“对来自考证派方面的批评的敏感在他的心理上造成了高度的紧张”；胡适似乎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深爱义理的戴震，“时时有‘超越的冲动’；不甘心训诂字义自限”^①；而以哲学为职业的胡适，则逐渐丧失提出“假设”的能力和愿望，陶醉于真能“拿证据来”的考据之学。这一点，胡适不如他为之辩诬的前辈先贤，也有违早年超越汉宋、会通中西的学术初衷。不过，倘因此认定胡氏的学术功过主要在考据^②，则又言过其实。在我看来，尽管胡适的“历史考据癖”吸引过无数青年学子，其“拿证据来”的口号也曾响彻云天，但胡适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仍以早年的“大胆假设”为主^③。

胡适终生提倡“拿证据来”，而且称其为“不单是研究史学的精神，更是伦理、道德乃至宗教家的精神”^④。早年靠这一口号“截断众流”，撰写中国哲学史时从老子、孔子讲起，一时石破天惊；成名后也因这一口号“作茧自缠”，不敢再挥动“开山斧”，只顾摆弄自家喜欢的“绣花针”^⑤。这就难怪，其扬名立万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永远只能是“卷上”了。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①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102页，香港：龙门书店，1976年。

② 如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中指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既有汉学的长处又有汉学的短处”（223页）；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也认定：“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72页）。另外，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胡适批判”，其中一个重要项目便是其考据学方法（参阅三联书店出版的八辑《胡适思想批判》）。

③ 在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五章“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中，我曾详细论证“胡适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思路，或者说其主要假设，不外乎‘双线文学观念’、‘历史演进法’和‘《红楼梦》自传说’；再就是孕育和推广这些‘假设’的‘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

④ 参阅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2378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

⑤ 1922年初，胡适对自己撰写并出版了《章实斋先生年谱》甚是得意，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我这本《年谱》虽是一时高兴之作，他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胡适的日记》2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记得熊十力和吕思勉都曾称道“五四”运动后胡适提倡科学方法的意义,但又担心世人过分迷信方法;因为,对于读书人来说,不讲门径不行,太讲门径同样有问题^①。在《超越规则》一文中,我曾对熊、吕二说做了如下发挥:“读书讲门径没错,错在以为有了‘科学方法’,就可以‘不甚下切实工夫’。治学讲方法守规则,容易入门上路;可万事都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别以为识得门径就能做出大学问。有时候‘门径’还真误人,‘野狐禅’虽说狂放,背地里其实心虚;而讲门径者以为得真传,学统在此,不免刚愎自用,更难得‘大器’,一入歧途便不可救药。”^②十多年过去了,重读旧文,我不改初衷——尤其是编订《胡适论治学》一书,更希望读者对于书中各文,既欣赏,也质疑。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选录胡适“论治学”的长短文章十八则,大致指向以下三个关键话题:学术经历的自述;国故研究的提倡;科学方法的阐扬。以“明白清楚”见长的胡文,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没有什么阅读障碍。因此,我的序言也就只好“说开去”。这么处置,不求有功,能避免“佛头着烘”之讥,已于愿足矣。

2006年2月16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连缀旧文而成

① 参见熊十力《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年并为林宰平祝嘏》,《十力语要初读》17页,台北:洪氏出版社,1977年;吕思勉《〈经子解题〉自序》,《论学集林》20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

② 参见拙文《超越规则》,《读书》1992年12期。

目 录

导言.....	陈平原(1)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1)
青年期逐渐领悟的治学方法	(17)
实验主义	(28)
《先秦名学史》导论 逻辑与哲学	(72)
《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	(79)
新思潮的意义	(102)
论国故学	(111)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114)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129)
“研究国故”的方法	(139)
再谈谈“整理国故”的方法	(143)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147)
读书	(173)

2 胡适经典论丛·胡适论治学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182)
校勘学方法论	(194)
考证学方法之来历	(207)
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	(214)
治学方法	(225)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胡适文选》自序

我在这十年之中，出版了三集《胡适文存》，约计有一百四五十万字。我希望少年学生能读我的书，故用报纸印刷，要使定价不贵。但现在三集的书价已在七元以上，贫寒的中学生已无力全买了。字数近百五十万，也不是中学生能全读的了。所以我现在从这三集里选出了二十二篇论文，印作一册，预备给国内的少年朋友们作一种课外读物。如有学校教师愿意选我的文字作课本的，我也希望他们用这个选本。

我选的这二十二篇文字，可以分作五组。

第一组六篇，泛论思想的方法。

第二组三篇，论人生观。

第三组三篇，论中西文化。

第四组六篇，代表我对于中国文学的见解。

第五组四篇，代表我对于整理国故问题的态度与方法。

为读者的便利起见，我现在给每一组作一个简短的提要，使我的少年朋友们容易明白我的思想的路径。

* 收入《胡适文选》1930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



第一组收的文字是：

演化论与存疑主义

杜威先生与中国

杜威论思想

问题与主义

新生活

·新思潮的意义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故我选前三篇介绍这两位大师给我的少年朋友们。

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辩证法的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化理论；依他本身

的理论，这个一正一反相毁相成的阶段应该永远不断的呈现。但狭义的共产主义者却似乎忘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海格尔更顽固了。

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我在《问题与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两篇里，只发挥这个根本观念。我认定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径全靠研究一个个的具体问题。我说：

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拢统解放，改造也不是拢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都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页六八）

我这个主张在当时最不能得各方面的了解。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我说：